

· 著名学者传略 ·

学术事功俱隆 文章道德并富（下）

——回忆先师顾廷龙先生

沈 津

三

顾老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前辈，德高望重，他一生辛勤从事图书馆事业。他是怎么会和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的呢？顾老在《纪念袁同礼先生百龄冥诞》一文中曾说：“一九二九年北平图书馆新馆落成，其址与北海相邻，美轮美奂，藏书丰富，编目和管理等均采用新法，与世界先进国家相应接，为我国第一所新型的图书馆。经过两年筹备，文津街新馆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幕，举办展览会。时余负笈燕京，前往参观，洋洋大观，美不胜收，对余此后终身务于图书馆事业，从事目录版本之学，有深刻的影响。”

1939年5月，叶景葵、张元济、陈陶遗、陈叔通、李拔可诸先生有感于抗日战争期间，倭寇肆虐，江浙文物纷纷流散，摧毁之烈，空前未有，文化遗产之沦胥，奭然心伤。有鉴于此，他们遂有在沪创办私立合众图书馆之意，并招顾老自北平赴沪主持馆务。馆名“合众”，盖寓众擎易举之意。在那个年代的上海，较重要的专业图书馆已有科学技术的明复图书馆、近代史的鸿英图书馆，所以叶、张、顾则创办了以古籍为主的历史文献图书馆，此

三馆均为研究性质的图书馆，便利专业读者，培养专业管理人员，编印专题书目。也是在那个年代的上海，除了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在陈立夫、朱家骅的支持下，由蒋复璁居中联络，为国立中央图书馆购得大量旧家藏书外，再一个就是“合众”了。合众馆从那时起，也担负了为国家、为民族保存文化遗产的重任，他们想方设法，征访江浙私家藏书，谋所以保存之策，不遗余力地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文献（1949年后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就是在合众图书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后又复统一于上海图书馆）。顾老曾告诉袁同礼先生“合众”创办的目的，就是“搜集各时代、各地方的文献材料，供研究中国及东方历史者的参考。在收购上所拟标准是工具书、丛书、地方志、地方总集、批校本、稿本等等。以私人力量办一专门性图书馆，前所未有。”顾老早年在“合众”的工作，做得非常之好，所以叶景葵先生有“集杜句赠顾起潜”，句云：“复见秀骨清，我生托子以为命；由来意气合，汝更少年能缀文。”由此可见一斑。

60年代初，顾老即感到在上海图书馆要做的事太多了，他首先想做的就是做好基础工作。其中善本组补充馆藏、编纂善本书目、整理尺牍方面的工作都是他主持进行的。我记得1964年时，在北京中国书店有一批家谱、鱼鳞册，数量极多，北京的许多单位都看不上眼，因此滞留库房，资金不能运转。差不多同时，在上海古籍书店、安徽屯溪古籍书店也都有大批鱼鳞册待售。上图得知信息后，迟迟不能作出决定，经请示顾老，顾老马上拍板，在他的过问下，这批图书迅速转入上图收藏。察其地区范围，多采安徽黟县、绩溪、歙县、祁门、休宁、宁国，江西庐陵、婺源等地；江苏江阴、浙江遂安、上虞、会稽等县。时代则从明万历至民国初年，如《万历九年丈量鱼鳞清册》，四十余册，均为填写本，按千字文排列。此外如顺治、康熙间的也很多。又比如说家谱，它

的重要性不必赘述。我们不妨用数字来看一下上图所藏家谱的增长，1952至1958年，上图家谱为五百余部，三千余册；1959至1964年，从安徽屯溪等地专门采购了五千七百余种，二万五千七百余册（不包括1955年在上海造纸厂抢救文献时获得的家谱，共八千十一种，五万九千册）。可惜的是，1964年反右倾，不能大买家谱了，顾老也为此事承担了责任。顾老从事图书馆古籍采购近五十年，深受顾颉刚先生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的影响，这份《计划书》含义甚深，计划周密，所拟采购十六大类的范围详述无遗，故无论在合众图书馆，还是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顾老都以此途径为收购目标。1981年初，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的《文献》杂志来约顾老写稿，顾老认为顾颉刚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就是在《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上，因为任何一位在图书馆从事采购者读了，都可一扩视野，而不为传统所蒙蔽，所以他就将这份《计划书》推荐给《文献》发表，并写了一篇文章勉述顾颉刚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国内的一些大型的、重要的省市公共图书馆的“家底”是很难搞得清的。1990年4月，我随顾老去南京图书馆在龙蟠里的书库参观，但见未整理之旧书甚多。所以，顾老感叹地对我说“没有一个大馆的家底是清的。”“要清，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编成书本目录。”顾老在“合众”时期，他和潘景郑先生曾编就了十数种各家捐赠图书目录。历史文献图书馆等四馆和上海图书馆合并以后，藏书大增，在各种准备工作就绪后，《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也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始于1961年，至1965年编竣，当时为复写纸所写，计八册。顾老是主编，潘景郑、瞿凤起两先生是做具体的校卡工作的，而我和吴织则是他们的助手。当时馆藏善本书约在一万四干部、十五万册左右。顾老给我们的工作就是据卡片提书、还书。顾师要求我们，“凡是潘、瞿两位和他校改过的每一部书，每一项的著录，包括书名、卷数、作者、版

本、稽核项、附注项，为什么要作这样改动，你们都应细细地看，并且要作核对，如果有什么疑问，就要马上提出来。”他要我们注意各种版本的字体、纸张、铃印以及许多著名藏书家、学者的字体，并且希望我们在抄本、稿本的区别、鉴定上多花一些工夫。我还记得那时我为了解清代重要藏书家黄丕烈的字体，曾把馆藏所有的黄跋、黄校调出来对比，而顾老则从书法的角度为我诠释黄字的特点。就这样，我们几乎将全部馆藏经眼一过。我曾在拙著《书城挹翠录》的序中写道，“这种实践是在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讲堂和书本上学不到的。至今我十分怀念那段时光，既钦佩顾老和潘、瞿二先生的道德文章，又感激他们毫无保留地谆谆以教、提携后进的可贵精神。”这实在是我的心里话。

上图的明、清名人尺牍简帖收藏约十一万余通（件），在全国来说，没有那一个图书馆、博物馆能和他匹敌，诸如《王阳明先生尺牍》、《颜氏家藏尺牍》、《八大山人手札》等等，应有尽有。但是，数量虽大，检索则不易，费时费劲自然不必去说，即便知其一也难知其二、其三。于是顾老就找人设计著录尺牍简帖的卡片，并设法请人将尺牍简帖的下款（寄信人）全部做成卡片，每札一张，列出在何种书札之内，并用四角号码排列。这样做，不仅可以将家底摸清，而且可以对寄信人，包括明、清、民国时期的各种人物的书札一索即得。如明文征明、祝允明、清曾国藩、左宗棠、民国孙中山、黄兴等人，都可立时查得在何种尺牍、手札中。像这样的检索方法，在国内领先其他收藏单位。很多研究近代史的专家、学者，都很重视《汪康年师友书札》的出版。由于汪康年长期经理报务，中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至辛亥革命，当时各派重要人物和他书札往来频繁，声息相通，《书札》保存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在美国哈佛的近代史专家孔祥吉教授就这样对我说过此书的重要，因为孔教授是研究清末维新变法的。他

从中辑得不少重要材料。实际上，早在 50 年代，顾老就考虑到这部六十巨册、七百余入、三千余通的《书札》的价值和有些学者利用这部书札的困难，因为《书札》中多为行书，间有草书，有些字不易辨认，如若抄写者以己意改之，则全失真意，必致误己误人。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请人全部抄出来，以便将来排印出版，供研究者利用。顾老终于找到了早年曾在商务印书馆任文书工作的高乐赓先生，此外还有项平甫先生，这两位先生早年都喜爱书法，受过书法的训练，他们的抄写工作做得非常出色，终于全部抄竣。这件事，如果没有当年顾老的策划，也就没有后来上海图书馆古籍组同仁的标点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标点本。这部《手札》后面所附的许多人物小传，都是早年汪诒年以及“合众”时期顾老就自己所知并请多人就记忆所及补出，供读者参考的。顾老对于名人书札，确是有一种偏爱的心情，我们不必去说 60 年代初期他主持的上海图书馆藏《明清名家学者书简展览》的事，而只要看他晚年为《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初编，香港中文大学收藏）以及为上海博物馆编的《宋人佚简》写的序就可窥见顾老的心境了。他在前书之序中说：“名人书牍，笺纸精良，书法洒脱，文字隽永，如能择尤影印，镕书文纸于一炉，不其美哉！集腋之愿，固余多年向往而未得者也。”

顾老在图书馆辛勤工作了六十年，他主持编纂了不少重要图书，诸如 30 年代的《章氏四当斋藏书目》、40 年代初的《明代版本图录》（和潘景郑先生合编）、50 年代的《中国丛书综录》、80 年代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90 年代的《续修四库全书》。这些重要图书都凝聚了顾老的心血。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和我谈他 1938 年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时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的事，他特别得意的是，他仅用了四个月就编出来了。他要我好好看一下这部书目，并把看后的意见告诉他。我虽是顾老的学生，但我不必去吹捧顾老，说实话，即使我们今天站在图书馆及读者的立场上各自去看，

这几十年来出版的不管是公家、或是私人的藏书目录，都没有任何一部超出它著录的详细。在那个时代，要编出一部具有特色的书目是不容易的，顾老是在总结了前人编纂书本目录的经验后，从有利于图书馆及读者的两种角度去编的。因此顾老认为书本目录除了索引外，一定要详细，读者检阅才不会困难，而且可以获得许多信息。所以《章氏四当斋藏书目》的编制突破了历来传统的著录，顾老除了每书的书名、卷数、作者、版本、稽核项外，又别其部居，录出每部书的题识、印章，甚至“其中校证之本，有假自友人者，复于各书题识之后加以按语，纪其姓氏爵里行谊之概略，匪特见当日析疑之助，兼可为后来文献之征。”又“凡章氏移录前贤题记不经见者亦录附之，以资稽考。凡书中题语有涉及章氏之友朋，就闻见所及者酌注履贯，以详渊源，藉见当年盍簪之盛。”这部书目，收书三千三百六十八部，分为三卷，费时四月，书成五册，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扎实的专业基础，那是无论如何都编不出来的。叶景葵先生在1938年9月28日致顾老信中有云：“接到四当斋书目一部，体例极善，足以表章式老劬学之里面，吾兄可谓能不负所托矣。”吴织曾经在“书海五十年”这篇写顾老的文章中说道，也正是由于这本《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成了日后叶景葵、张元济先生等人创办合众图书馆前，邀请顾老来沪主持工作的“牵线者”。

数百年来，有经济力量的文人学者有感于图书之难得，多有辑佚丛书之功。因此，丛书之辑印，起到了化身千百、流通古籍、便于学者利用。“合众图书馆”创办于“搜残编于乱后、系遗献于垂亡”的年代，顾老考虑到以传布先哲精神于万一，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秉承前人之志，有编辑《合众图书馆丛书》之举。《合众图书馆丛书》共分二集，第一集共十四种，第二集为一种。以一个私人创立的图书馆编辑出版丛书，在当时是不容易的事。第一集从1940年至1945年间，由私人募捐出资而陆续付诸石印

行。60年代初，顾老曾告诉我，当年印这些书很难，因为国民党政权不稳，币值不保，筹钱不易，所以拖得很久。在第二集《炳烛斋杂著》的跋中，他写道：“时方多难，筹款未集而罢，忽忽四年矣。”“国难未已，物价动荡，瞬息万变。”这些书除了第一种《恬养斋文钞》为陈陶遗先生题署外，其余十三种都是顾老所题。为了节省开支，顾老亲自动手，钞成了《东吴小稿》及《论语孔注证伪》（卷下）。顾老在《丛书》“缘起”中说：“本馆丛书之辑，志在使先贤未刊之稿、或刊而难得之作，广其流传，顾非一馆之藏之力所克胜任。缘商同志，谋集腋成裘之举，所选著述以捐资者之意趣为指归，各彰所好，各阐所宗，学海无涯，造诣不一，要其专治所学，发抒心得，必有足贡献于后来者，勿偏持门户，勿执一绳百，采撷英华，视读者之去取何如耳。际此世变抢攘之日，物力凋刻，旷古未有。丛书之印，先后六年，成书十有四种，编次不免芜杂，工事每况愈下，因陋就简，咎何敢辞，勉强为之，犹贤乎已，因便流通，汇编成集，述其缘起如此。”

顾老对于善本的理念在于当代图书馆专业人员不仅要保管好先人们流传至今的珍贵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在于利用。他曾说：“窃谓今日管理善本，重在重印，使其化身千百，代代相传，不至湮没。”在上海图书馆时，为使孤本不孤，他又提出影印（石印）馆藏善本的计划，在馆内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影印了如《唐鉴》、《梁谿先生文集》、《词人纳兰容若手简》、《三峡通志》、《太康物产表》、《分门琐碎录·农艺卷》、《稼圃辑》、《浦泖农咨》、《台湾府志》等。70年代后期，又影印了《永乐大典》（“郎”字韵）、《农桑辑要》等。又交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影印了不少重要善本。顾老在《宋人佚简》序中呼吁：“希望出版界对现在古籍，择其稀见者为续命之谋，终使孤本不孤，秘本不秘，有利于学术研究，岂不善哉！”这些都体现了顾老为读者服务、为学术界提供资料的一贯思想。顾老也曾主持撰写《上海图书馆古籍善本书提

要》，当时第一步想把馆藏最重要的一级藏品先撰成提要，参与撰写的有顾老、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沈文倬先生等。可惜只写了数十篇，用上图印的小稿纸，如今也不知存否了。顾老早年写过数十篇题跋识语，所撰跋语，言之有物，精义蕴蓄，裨益后学甚多。

《中国丛书综录》是一部大型的参考工具书，集全国四十一个图书馆所藏丛书二千七百九十七种，收有各种学术著作三万八千八百九十一一种。为了便于读者查找，其编纂从丛书书名、子目书名、著者姓名三个方面去查寻。这本书的出版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文革结束后到80年代中，我在接待许多到上海图书馆参观访问的海外东亚图书馆同行时，他们都会提到这本重要工具书，称之为“功德无量”、“嘉惠学林”。这本书仅题“上海图书馆编”，而实际上负主编责任的是顾老。在《综录》出版之前，顾老一直对于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编印的《汉籍目录》耿耿于怀，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日本人也太狂妄了，嘲笑我们没有能力编这种大型的工具书。陶湘涉园所藏为日人所攫取，其中丛书一千余种，然而日人却在《汉籍目录》的跋中说：“世之读支那书者，皆将赖其利焉……凡宋元而还，逮乎近代，效左禹锡、陶南村之为而不在我库者盖鲜，则凡公私之库藏支那丛书而苦于检阅者，亦可赖此目而求也。”实际上，编这本《综录》是萦绕在顾师脑海中许久的一件大事。然而，顾老就凭日本人这种狂言，他也要为中国人争这口气，为民族为文化去争得荣誉。所以50年代中，他率人先将“合众”时期所收集的丛书，编制了列有子目的卡片草目，并入上海图书馆后又增加许多，又说服谢国桢先生放弃以个人力量编纂丛书目录的设想，最后联合北京图书馆等单位提供的馆藏，仅用了一年三个月的时间编成此书。这是中国历史上收书最多的古籍目录。他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出日人，而且在质量上、检索方法上都领先于日人。

做学问的人莫不把重要工具书、参考书看作是开启治学门径的钥匙，而图书馆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利用馆藏的文献、资料来编纂各种目录、索引或其他工具书来为学术界、为读者服务。上海图书馆几十年来在这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其中《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就是从1959年起，组织馆内二十余位工作人员，还有十多个中学百多位学生在万象森罗、不可悉数的旧期刊中核查原刊，反复配套，将杂志中的每篇文章，甚至“补白”逐篇登记，把刊名、创刊、停刊时间、刊期、卷次、出版年月、作者、译者全部反映，历时七年，一式三份，写出卡片一百数十万张。那时顾老每星期都会抽半天前去徐家汇藏书楼了解进度、解决疑难、指导工作。1965年出版了《汇录》第一集（1857—1899）。第二集（1900—1911）及第三集（1912—1918）陆续付排，并打出校样。而1919—1949.5月以前的篇目全部抄齐卡片，只待整理编辑，但因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工作停顿，而将卡片分装三十八个大木箱保存，以俟运动结束后再重新启动。谁知道，“文革”中，工、军宣队竟以徐家汇藏书楼“房屋拥挤”为名，把视为“四旧”的三十八箱期刊卡片作为废纸处理，以六分钱一斤的代价整车运出，卖给了废品回收站，进而并入造纸厂化浆，终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当时他被靠边审查，没有发言权，而且事前也毫无所知，这件事使顾老为之痛心不已。他没有想到，有些人竟然无视文化的需要，竟使许多工作人员克服了众多困难、费去不知多少汗水、心血而成的重要资料荡然无存。他一念及此事，就会发闷气，一句话也不说了。我知道他对此事是很痛心、很难过的。因为后来他就此事写过一篇文章，文内就有“每念及此，不禁老泪纵横，情不能已”。真可想见他的心情。他对我说过，“做图书馆的人，心中要有读者，要为他们服务，不为读者服务那还要图书馆干什么。”他还说：“不能为读者提供方便，这是最难受的事。”

“文化大革命”初期，顾老受到不应有的对待，他被靠边审查。

1967年有一天，我接到上海古籍书店韩振刚先生的电话，说是他们店里最近收到一部明刻本的书，想送来上图请帮助鉴定。记得那天是下午三时左右，地点是在上图西大楼底层俱乐部乒乓球桌旁，我请顾老、潘景郑、瞿凤起三先生都到场鉴定。上海古籍书店的韩振刚和高震川两位先生送来了一包书，打开一看，有的书已成饼状，粘在一起，有的还可以翻阅。这即是后来定名为“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的《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十六种（附《白兔记》传奇一种）。韩说了他们得书的经过，并说由于书是从棺材中取出，所以希望能将书用紫外线加以照射，以求“消毒”。我都帮忙办了。顾老他们看后，都表示这批书很难得，过去从没有见过。顾老并要我到大书库借一部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来，要我翻一翻郑著中有没有写这个时期这种图书出版的事。我翻阅后即告诉顾师，郑氏没有见到这类的书。顾老在韩、高两人走后，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这些书很重要，是研究中国俗文学史、戏曲史和版画史的重要见证。他要我打一个电话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杨嘉祐先生（杨当时在“老上海组”），把这件事告诉他，因为这是“地下发掘物”，根据有关法令，“凡是地下发掘物，一律归公家收藏”。所以第二天上午，杨嘉祐先生就持有关文物法令前去上海古籍书店依法收回此书，改由上海博物馆收藏。（这件事，我在“论新发现的孤本小说《出像批评海陵佚史》及其它”（台湾《书目季刊》1995年第二十九卷一期上有所述及）当然，这部书经过学者的研究，可以肯定这是我国现存诗赞系说唱文学的最早刻本，它的发现有助于弄清中国文学史上“词话”的真貌；而成化刻本的《白兔记》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传奇”刻本，更是研究南戏和早期传奇的重要见证；而书籍中的版画，也是国内现存最早的戏曲小说插图之一。这件事，我是经手人，所以清楚。可以说，如果没有顾老的建议，那这部重要图书会发生什么样的结局，谁也不知道。

经过顾老和王元化先生等人的呼吁，报纸舆论的宣传，社会上许多学者都知道上海图书馆藏有清末重要官员盛宣怀档案，现在这批档案正在作大规模的整理。顾老是深知这一档案之重要性的。连上海图书馆的许多人都不知道，顾老在1970年夏奉命参加一个从盛宣怀档案中查找钓鱼岛资料的小组，小组的成员还有潘景郑、瞿凤起、沈宗威（上海博物馆）和我，负责此事的是上海图书馆革命委员会委员聂佩华。工作的地点在上图东大楼301房间。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参考消息》上刊登了日本政府蓄意霸占钓鱼岛的消息，有学者经过考证说清慈禧太后曾赏赐钓鱼岛给盛宣怀事，并影印圣旨以证。因此，我们几个人每天都要小心查找，生怕漏掉。结果，有关钓鱼岛的文件等什么也没有查到，只好收兵。但是，翻了一遍，大家对档案的性质也清楚了。

在1970年初，他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被派往上海市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参加抄家图书整理的工作。在清理小组时，几乎每天都有单位将被抄家者藏的图书送来，他又和书打上了交道，人虽然累些，但心情似乎宽松了许多。凭着他数十年的实践经验，他发现了不少熟识或知名者的手迹，包括抄本、稿本和信札。如刘半农、姚石子的日记；老舍的手稿、鲁迅的手札、张元济批注本《邵亭知见传本书目》等等。这些原本（件）上并没有署名，幸好顾老识得他们的字，于是就将之妥善保存，不然的话，碰到“不识货”的人那还不知如何“收拾”呢。最可惜的是他在乱字纸堆中发现半卷唐人写经，急忙再细找另半卷，却怎么都找不到。后来问起别人，才得知那半卷因被人认为是残卷，没有什么用而扔了。顾老听后愕然不已。1972年，上图成立古籍组，顾老又被调回来，他和我说起此事，总觉得怅怅的。

四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流传至今的善本古籍是其中尤为珍贵的

部分，也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宝藏。自古以来，公私编纂的古籍目录难以数计，但却没有一部集中反映全国古籍善本总貌的目录。1975年10月，病重中的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尽快地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四人帮”被粉碎后，这项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1976年底，北京的有关部门指定顾老专程去京听取指示。他在听完传达返沪后，非常兴奋，他深深感到这是总结中华民族珍贵文化遗产的大事，这样的大型目录，是过去藏书家、学者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书目》虽是简目，但可按图索骥，为学术研究求书之导引，为目录版本学的研究，为整理古籍提供大量线索。为此，他表示，古人云：跬步不休，跛鳖千里，累块不止，丘山丛成。七十三岁的他不顾年高体弱，以极大的热情，不辞辛劳，信心百倍地投入了工作。

他是深知古籍整理和版本鉴定专业人才匮乏的事实，“文革”前，他为了这方面的人才青黄不接，曾呼吁要尽快解决古籍鉴定、古籍修复等人才短缺问题。“文革”中，古籍、历史文献都被视作“四旧”，他连提建议的权利都没有。所以，有了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机遇，他要用他的所长去培养古籍版本鉴定专业的接班人。1977年夏，他应四川省图书馆之邀，风尘仆仆地携我一起赶到四川省乐山市，为蜀馆举办的“西南、西北八省古籍训练班”授课。参加训练班的约八十余人，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的图书馆、博物馆、文管所的工作人员。顾老是用苏州国语讲课，我在旁助顾老在黑板上写字。有些课是我替代顾老讲授，顾老则坐在旁边为我助阵。课后和晚上，都会有一些“同学”来我们住地商讨问题。我们在乐山待了十天，饭后暇时，我们便会在大佛寺旁散步，顾老的心情非常之好，有一次，他对我说：“这几个省来的人以后回去，不光是要在实践中运用学到的知识，而且他们今后还会注意如何保管，如果每个图书馆都有懂得古籍重要的人，那也算是后继有人了。”

从1978年3月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会议上，顾老被任命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任主编始，至1995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庆功表彰会”止，顾老参与了整个编纂工作的初编、汇编、审校、定稿的全过程。为了编好这本大型目录，他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建议。为了使目录的质量有所保证，他曾将上海图书馆的善本书卡片逐张审阅，发现问题，即行改正。他还亲自执笔写成了上海地区在普查、编目古籍善本书卡片的一些体会，打印出来供其他省的同行们参考。1978年11月初，在四川成都召开“总目”（当时称“总目”）编辑委员会扩大会议前，顾老考虑到初次参加善本编目工作的人，在版本著录方面最好能提供实例，参证对比，有所借鉴，以应急需，就提议从上海图书馆馆藏中选出一些宋、元、明、清刻本和抄、校、稿本，编成《善本书影》，并略具简说，让大家参考。事后我们选出三十种，简说是潘景郑先生和我撰写的，并全部由顾老改定。任光亮先生负责和上海古籍书店联系，并承他们大力支持。影印《善本书影》从编辑到出版，仅用了一个星期。我记得，书刚印出，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装箱，随后带往成都，提供给来开会的代表们了。

1980年5月，顾老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汇编工作，自沪赴京，住在虎坊桥香厂路的国务院信访招待所内，和各地图书馆的专家和工作人员齐聚一堂，我和上海图书馆的任光亮先生则追随顾老左右，朝夕相亲，沃闻绪论。他在北京和大家一样，认真工作了八个月。说实话，除了居住在北京的同仁外，其余各地来的三十三位专家和人员都克服了地区、生活、家庭、个人的不少困难。对于顾老来说，虽然他很乐观，他说我是一個人，走到哪都行。实际上，他即使有困难也很少向人提起，因为他不想多麻烦别人，给别人增加负担。比如说，顾老是典型的苏州上海人，一日三餐吃的食物也多为南方口味，而在北京，早晨的薄粥、馒

头，和上海的早餐习惯不太一样。星期天只供应两餐，对于久居上海的南方人也只能设法适应。有时，顾老就会约我和任光亮先生去虎坊桥的“砂锅居”打牙祭。又如招待所的厕所是“蹲坑”，去厕大解，这对一个平常人来说是小事一件，但对于高龄老人来说则是有些麻烦，他的脚力不济，不能时间太久。这一点我很了解，我曾和顾老在峨嵋山下夜宿，那里的条件较差，夜晚如厕必用手电筒照明，所以我陪顾老去时，才知道老年人的不便之处。在香厂路初期，他还希望能在“坑”旁加扶手，以便撑持。后来，负责后勤的同志得知才设法为顾老换到另一幢楼，靠近有抽水马桶的厕所旁。记得1981年初，香厂路的汇编工作告一段落，各地的同志都准备返回所在地，毕竟在京八个月了，大家都有“归心似箭”的感觉，这时顾老对我说，“我要最后一个离开香厂路，大家走了我才走。”当我将顾老的话转达给潘天祯先生（副主编）时，他很感动，他说应该顾老先走。我说：“别争了，你们走了，顾老才放心，我们也才走得掉。”我可以说，在他身边工作那么久，顾老对人、对工作、对事业，从来都是质朴无华、以情相归，从未盛气凌人、顾盼自雄，他也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名誉地位搞什么特殊化，或去谋取自己的私利。

顾老晚年做了不少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成并出版了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以及与顾颉刚先生合辑的《尚书文字合编》。《尚书》为中国最早的古史文献，儒家列为经典之一，对古代政治、文化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是研究中国历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但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数种不同字体，从而成为一部文字最有争议的经籍。顾老早年曾对《尚书》文字作过研究，他曾自署“隶古定居主人”。“隶古定”之“隶”，为正书，以其由隶书演变而来。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说，“隶古定”就是用正书按科斗古文笔画写定的本子。《尚书文字合编》是汇集历代不同字体《尚书》本子为一编，旨在正本清源，通过探索其文

字变迁之踪迹，以开拓研究之新途径。1931年，顾颉刚先生在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尚书学，他为了解决《尚书》文字问题，提出从研究历代传本的字体入手，并计划把各种字体的本子集刻成一编，看它因文字变迁而沿误的文句有多少。为此，他和顾老于30年代着手编纂《尚书文字合编》，将搜集到的历代本子摹写刻版，后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80年12月25日，顾颉刚先生病逝，顾老在参加颉刚先生的追悼会回来后对我说：“等回上海后，要找时间、找人重新整理编纂《尚书文字合编》，再不做，怕没时间了。”这时顾老已经感到继续此书的编纂是迫于眉睫的了。实际上，早在60年代初、70年代末，顾老二次要我在原历史文献图书馆馆址（上图长乐路书库）寻找30年代摹写刊成的《合编》的版片，但都因杂物堆放，探觅困难而未能找到。1982年6月，上海市委宣传部干部来上海图书馆看望顾老，并征求意见。顾老即以此事提出，后承允准配备助手。年底，即有孙启治先生调入上图协助编辑工作。孙来后，顾老对我说：“现在有专人做了。火车只要开，终归要到站的。”1991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当年9月底，顾老给我的信中有涉及《尚书》的事，“贵馆有无英法所藏敦煌经卷的胶卷？上海图书馆有一份，是从北图拷贝的负片，复印出来很不清楚，不知贵馆有正片否？我想贵馆必有之，选堂先生深研敦煌之学者，必知之。我要关于《尚书》部分。如果尊处有正片，我将把英法两国所藏有关《尚书》的号码开呈，拟恳复印一份。”后来我在中大图书馆找到一些台湾影印的英法所藏敦煌经卷中的《尚书》，复印后给他寄去了。顾老给我的信中说：“颉刚先生的《尚书文字合编》，‘古籍’允出，在进行中，我有生之年，或可一见。”1994年2月的信上有“我手中尚有《尚书文字合编》一书，今年可以完成。要求上帝保佑维持我一年，可向颉刚先生报命了。此事中断了六十年，多幸党和政府之关心，配备助手得以有成。现在正在写序文，比写‘读史方輿纪要序’从容些。”

“今年二、三月，我要回上海一行，希望能把《尚书文字合编》发稿，此属国家古籍规划小组重点项目。”1995年4月的信云：“我去年一年，忙于《尚书文字合编》工作。写前言，请人提意见，一再修改，今始定稿，其迟钝可笑！今年可出版。”1996年2月的信云：“去年一年中，上半年忙于《尚书文字合编》的前言。此书只不过提供资料，而不是研究成果。发动到成书跨度为六十四年。总算完成了，可以告慰颉刚先生于九泉。”

《读史方輿纪要》是清初顾祖禹费时二十年而撰成的一部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文献，叙述各省、府、州、县建置沿革、疆域变迁，侧重于山川险易、攻守异势，对旧輿地书名实错误，据正史多有订正。为了将这部重要稿本影印出来，他费了不少精力。我在香港时，他还曾在给我的信中要求我查找台湾出版的张其昀全集，看张氏有无撰写有关顾祖禹的文字，1991年9月的信云：“台湾张其昀先生有全集出版，本数很多，大陆（上海恐无，听说价很贵）不知何处有（陈叔谅先生有一部，不全，陈先生不久前又已作古）？贵馆如有，请您查一查，张集中有无关于顾祖禹的任何撰述。抗战前，张先生亲到无锡、常熟访问顾祖禹的遗事。在常熟顾曾居住过地方，获得有一笺，末署‘禹’字，认为顾的遗墨。张当时即以照片寄赠钱穆，钱穆即拍一照片寄我，我恐久而褪色，即托友人用珂罗版印了数纸，一直夹在稿本的第一函，今已失去，不胜遗憾！钱穆、张其昀两先生均已下世，惟我知之，而我的一份也没有保持，怅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稿本已影印竣事，明年可出版。亟待将‘禹’字一笺印入以为插图。我想只有您能助我一臂了。”1993年12月的信上说：“可喜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稿本，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景印问世，我算解除了一件心事。”1996年2月的信又说：“前年把顾祖禹的《读史方輿纪要》稿本景印出版。揆初先生主张先印后校，钱穆先生主张先校后印，意见皆好。但屡更变故，亦蹉跎了六十年，终与读者见面。”

五

对于晚年的顾老来说，最遗憾的就是《吴恣斋先生年谱》的修订工作只进行了一半，而来不及完成了。《吴恣斋先生年谱》是顾老 1935 年出版的一部重要著作。早在他童年时即知吴大澂名，后读吴著《说文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实验考》，遂研求吴之学术，并在吴湖帆先生处得窥所藏吴大澂未刊之稿，又从其外叔祖王同愈先生处得悉吴氏行谊，于吴氏为人及政绩、慈善、学术多所钦佩。1929 年冬，顾老自槎溪返苏州，得到王同愈、王董咸两先生之支持，于是开始了《吴恣斋先生年谱》的编纂工作。这本书写了六年，潘景郑先生的序云：顾老“笃志好古，研治文字声音训诂之学，恒服膺吴先生之说，以为精诣独深。尝有志搜罗先生行事，辑为年谱。于是博稽遗闻，咨询故旧，偶见先生片纸只字，靡不备录。曩岁游故都，复由清军机处档案中录存先生奏疏若干通，以资采择。又以先生著述浩繁，未尽刊布，复搜辑见闻，得已刊未刊者若干种，录其要领，别为著述目，附年谱之后。由是而先生之经济学问，睹此一编，瞭如指掌矣。”《年谱》出版后，他又找到不少资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顾老很想把《吴恣斋先生年谱》加以修订，而且东北某地有人给顾老来信说，《年谱》中所引用的资料和文献在当年对俄国的边界划分上，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中，顾师先后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获得不少吴大澂的信。我也为他收集了一些。1981 年我在上海旧书店期刊门市部里购得《吴恣斋先生年谱》后即告知顾老，他要我赶快打电话给书店负责人，说《吴恣斋先生年谱》有几本要几本。可惜后来只找到一本。1991 年 6 月，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昨由馆中转到大函及恣斋手札影印本，昔未见过，无甚珍感！《恣斋年谱》有教育出版社许为出版，但龙无暇修订，新材料已积不少，只待编次。”1992 年 8 月的信上又说：“我现在

身体尚好，打算修订吴氏年谱，新材料收得不少。”1993年8月的信上又说：“我现在还是整理《尚书文字合编》，交稿以后，将《吴恂斋年谱》补充，材料已有不少。以前所见材料，今已无从踪迹。新的材料，则皆昔日所未见者。最可惜者，我离京前为燕京购得的《铭安日记》，竟不可踪迹，其中叙及与恂斋往还甚多。当年如有复印技术就好了。芦沟桥事变后蓝晒亦已停止了。怅怅。”顾老也曾专门来信要我查找《铭安日记》，但都没有查到。我真是希望顾老的其他学生能继续顾老的此一未竟之业，顾老地下有灵，当也含笑九泉了。

1981年春，顾老七十八岁了，身体仍非常健康，不少人都说，顾老看上去年龄不满七十。但是，考虑到他过去写的论文和文章散在各种杂志、报纸中，他自己也没有好好收集，于是我对顾师说，您早年写的专著都是成本的，容易保存，我很想把您的这些东西收集起来，包括序跋，按类编成一本书，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小结。他也说，有些文章发表后他剪了下来，当时放得好好的，但时间一久，就不知放在何处了，找也不容易。顾老家中的书桌是放在卧房内的，书桌两旁堆满了书、信件、材料，比较杂乱。有时我和内子晚上去看他，内子就帮他略加清理。顾老同意了我的看法。并把从家中找到的一些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文章抽印本都交给了我。星期天，我则根据顾老提供的线索去徐家汇藏书楼查阅旧报刊中顾师的文章，如《禹贡》、《民间》、《燕京大学图书馆馆报》等，又从一些书中辑出他早年写的题跋，大约在二十万字左右。1986年2月，我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作图书馆学的研究，临走前，我去向顾老辞行，并将我所收得的顾老所写文章、题跋、行状等等全数交还。并说，等我回来后再继续这项工作。两年后，我返回国门，但工作更忙了，担子更重了，我和顾老都无暇再补缺遗了。但是，顾老在完成了《尚书文字合编》的前言、后记以及印出了《读史方舆纪要》后，他想清理自己历年来写作的

文字了。1996年3月，顾老给我的信中说：“现在清理拙稿，居然有上海书店、安徽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表示愿为刊印。您是最早为我搜集之一，吴大姐（吴织）为我整理了几年。今后将致力于自行校阅。”1997年12月，我才从上海图书馆陈先行君的信中得知顾老的文集已由上图的一些同事在继续补充，信中说：“我们想在顾老九十五岁生日前将他的文集编印出来，这事您以前做过。顾老想请王煦华与您写序……王煦华、朱一冰已抄顾老文稿约二十万字，我们又补充了十多万字，而吴织以前曾誊抄过顾老的日记，这样就可能有七十万字以上，较为可观。”今年4月我在上海，看了陈先行君处顾老文集的稿子，基本编就。可惜的是，晚了，顾老走得太快了，他来不及看到他为人们所留下的文字的结集出版了。

当顾老听说美国有一图书馆欲请我去编纂善本书目时，他力劝我勿去，他在信中说：“龙所有一知半解，全在燕京八年所积，回沪后，日在事务堆中生活。现在吾弟尚有余力为我搜集资料，若去美工作，则必比较忙杂，工作紧张，于健康有影响，此皆我体会之言。”然而，顾老在得知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要请我去撰写该馆的善本书志时，他却大力支持、赞成。顾老1991年9月给我的信上说：“您有赴哈佛之意，我很赞成，他们条件好，编书志，与您很适宜，待遇亦较优。我与哈佛燕京还有点感情，我助裘开明先生编卡片，校书本目录，您必知之。我上次赴美，未能前往，实一憾事。……以后有机会，可图一游。”1992年4月底，我从香港飞往美国，做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抵美仅一个星期，居然收到了顾老自上海寄来的法书一幅，上书“莺迁”两字，是写在红色洒金纸上，小篆线条匀称，粗细划一，婉通圆转。这是顾老为祝贺我移居美国而写的。1996年2月，顾老来信说：“我有一事奉托，您便中留心搜集一点裘开明先生的遗事，他来燕京，讨论分类，皆尚相契，颇欲写一点纪念文字。如果年隔已久，

找不到了，亦就算了。裘之后任是否即吴文津继任？吴延请您去哈佛，编纂书志，他有见地，亦能识人，为事业着想，忠于事业之人，最可钦仰。”裘开明先生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30年代和顾老相熟。70年代中，有一天晚上在他西康路的寓所里，他从靠墙的书架末格取出裘开明编的分类法一大本给我，要我看。他说，在那个时候，这本分类法是编得不错的一本。后来，裘开明先生来上海图书馆参观访问，适巧顾老在沈阳探亲，不及赶回，他就嘱我好好接待。

从1960年至1990年，三十年中，杖履亲承，顾老对我的教诲，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我的每一点进步，每一点成绩都是和他的口传心授分不开的，这里面不知凝结了顾老多少心血。正是由于他的指导，我从一个未谙图书馆业务的学生，逐步成长为当时（1988）中国图书馆学界最年青的研究馆员，那一年我四十六岁。我的第一本书《书城挹翠录》的扉页上印着“谨以此献给我的导师顾廷龙先生暨吴文津先生”。正是因为顾师的诱掖、引导，才使我进入了目录学、版本学这个领域，而吴文津先生则把我导入了“哈佛燕京”这座欧美地区最重要的殿堂。1992年5月至1994年4月，我在写作《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志》时，才充分体会到如果没有当年顾老对我的严格训练，没有那时打下的基础，我是很难在两年之中写完这部百万字之书的。我实在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受益无穷”。

顾老在北京住院治疗期间，医生多次发出病危通知，我在和上海图书馆的多次通话时均有知悉，因此可以说，对他的过世我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我又从一位从上图前去照看顾老的同事口中得悉，顾老目前病情有所稳定，医生说或许可以有半年的生命延续。我听后大感欣慰。8月20日，我在看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的校样后，在写给责任编辑的信中还说，“我希望年底能见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让顾老看一

眼”。校样和信是用特快专递的方式寄走的。可是三天后却传来了顾老去世的噩耗，我难过，我悲伤，我不知该怎么形容我当时的心情。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为了上海图书馆新馆庆典，1996年的11月下旬，我即已飞抵上海。二天后即去北京探望顾老。当天上午，我在中华书局打了个电话给顾老，告诉他我下午会去看他。他非常高兴，要我早点去。我说，你先睡个午觉，醒了我也就到了。是“中华”的副总经理沈锡麟兄陪我一起去探望顾老的。顾老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精神很好，只是瘦了些，耳朵有点背，有时需要助听器。我告诉顾老，“我们师生之间确实是有缘分的。六十年前，您在北平燕京大学，曾作为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驻平采访处主任，为哈佛燕京馆的藏书建设打下了基础；六十年后，我却在哈佛燕京馆司理古籍善本之职，这绝对不是巧合，难道这不是缘吗？”他笑了。他说了一些和哈佛燕京第一任馆长裘开明先生以及洪业（煨莲）先生交往的事，他还表示，1989年他去美国参加“全美中文善本书联合目录国际顾问会议”时没有设法去哈佛燕京馆参观访问的遗憾。那一天我离开前，我为他拍了几张照片，也录了一段影带以留作纪念。

上海图书馆新馆庆典的前一天，顾老在顾诵芬先生的陪同下也来到了上海。当天下午三时我去招待所看他，只见他放弃午休，伏案用毛笔书写《顾廷龙书法选集》送有关领导“教正”之类的识语，一共写了十多本。他在写字的时候，我为他拍了一张照片，这也是我为他拍的最后一张照片。当天晚上，上海图书馆为欢迎海内外来宾而举行酒会，因顾诵芬临时有约，不能出席，诵芬就把我拉到顾老身旁他自己的位子上，请我照顾顾老。我清楚地知道，今后像这样师生共在一桌吃饭的机会太少了。我还是像过去随侍他去各地开会、讲课、访问期间对方招待的饭局一样，为他挟菜盛汤，只是这次我不敢为他挟太多的菜了。

我和顾老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上海，那是1996年的12月23日，是冬至。那一天的晚上，是方行先生在华东医院附近的一个并不起眼的佛寺内请吃素斋，据说此家素食是上海地区最好的，并不对外营业，只是招待重要来宾的。谁又能够知道那竟是我们师生两人从此天人永隔呢？今年2月，我写信给顾老，告诉他我4月间要回上海探亲，那时他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如在京，那我会飞北京探望他。但是我没有得到回音。我在沪的时间不多，又因我犹豫不决，而失去了飞往北京的时间，失去了最后一次和他老人家见面的机会，我怅怅然只得离沪飞港了。

顾老撒手人寰、御鹤西归了，青山虽在，哲人其殒。顾老将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他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我来说，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良师，最尊重的一位长者，三十年来，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循循善诱、耳提面命，都是我铭感五内的。对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来说，则失去了一位图书馆的事业家、一位近代以来最重要的目录学家和版本学家。但是，顾老的办好图书馆的理念、服务于读者的精神却永远长存；他的不慕荣华、不钻营取巧的风骨，他的诲人不倦、克尽厥职、功成不居、坦荡旷达的君子学风，连同他的音容笑貌也将永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

我知道，这篇小文肤受不足以表扬顾老之学行于万一，然而，我仅以我一个学生崇仰导师的心情去缅怀先师的一些往事，希望能对后来之人有所启迪。

作者工作单位：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